

灾难视域中的人性书写

——以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为中心

王 俊 虎 廖 慧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讲述了百年前发生在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一场鼠疫中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作者透过作品中的灾难情境展现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表现了作品穿越时代的生命力量及其映射出的人性光辉。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代背景之下,解读《白雪乌鸦》中的人物典型,关注其中的人性书写,审视人性的复杂性,拷问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探讨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对于思考“灾难之下,文学何为”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大有裨益。

关键词:《白雪乌鸦》;灾难;人性书写;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3-0053-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306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灾难文学再一次以其题材的独特性与主题的崇高性闪耀于文学舞台。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近年来,国内灾难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伴随着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的发生不断涌现。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以塑造灾难中的典型人物、展现灾难中的不同人性、独特的温情视角以及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使作品获得了独特而深刻的意蕴。以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为中心,选取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围绕灾难中的人性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与剖析,可以近距离审视文学对灾难、对人精神的净化和人文关怀。

一、迟子建《白雪乌鸦》的特别之处

(一)写作背景的双重性

这里的写作背景包括作品中所呈现的背景和作者的创作背景。我们都知道文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好的文学作品创作需要作家丰富的生活经验积累。《白雪乌鸦》的创作源头最早要追溯到非典时期,当时的景象在迟子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历史仿佛是一个轮回,非典的防控措施使她了解到

收稿日期:2021-03-10

作者简介:王俊虎(1974—),男,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作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

了百年前在家乡东北也曾发生过一场正在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灾难——鼠疫。这触发了迟子建内心的温情,她力求用文字的叙述来还原那段历史,想要创作一部作品在记忆灾难的同时也用以人性的疗救,在物质文明严重侵蚀精神文明的背景之下,用温情的文字为人们构建出一片神圣的精神净土。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说:“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生命之学、人的情感学、人的心灵学、人的精神现象学”^[1],一切文学作品的创作,最终受众都是人,最终影响的也是人。迟子建的作品更是一直关注和体现着人的生存意义与精神作用,她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创作者这一角色,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让人们铭记灾难,走出困境,感悟人性,体验温情。但是迟子建并没有为了迎合时代主题而急于成章,因为她要创作的是一部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反映灾难表象之下隐藏的更深层次意义的作品。迟子建为了真实地反映百年前家乡的那场鼠疫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资料的收集、实地考察、询问群众到最后成书竟耗费了七年之久,这是作家对于艺术真实性的寻求,足以体现这部作品的独特性质和重要意义。迟子建将作品的背景放在了1910至1911年之间的哈尔滨傅家甸,此时的东北基本上是被日本和俄国侵略占领。与此同时,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还在不合理地延续着,生活在东北大地的中国人既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威胁,更经历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岁月。鼠疫便在人们猝不及防的困窘之中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这样真实的历史写作背景下发生的真实故事使得小说更加具有信服力,让读者具有更为强烈的代入感和体验感,在百年后的今天,读者的阅读体验依然生动形象。

(二)不落俗套的写作手法

不同于记叙历史的宏大叙事,迟子建不着力于去描写塑造崇高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倾心于那些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小角色,通过对小人物在鼠疫中的种种遭遇和背后所体现的深刻含义予以解读,从而展现作品的温情力量。对于具有救世主类型意义的英雄人物的描写,迟子建也将他们置于与小人物同等的地位,不做任何夸大的拔高,仿佛置身于一种上帝视角,从容不迫地观察着发生于人世间的故事,始终以一种温暖的爱意来进行描述,闪动着柔和之光。“作者用充满温情的话语来诠释人生的苦难,把灾难中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对温暖和生存永恒的渴望呈现了出来,展现了迟子建式温情的艺术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2]按照傅家甸鼠疫发生之前、鼠疫爆发之时、鼠疫好转结束之后这样的时间顺序依次展开,对鼠疫中形形色色的故事,通过交错在其中的几十个人物群像进行描绘刻画,一点点地铺陈叙述,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灾难下的众生相。

(三)深刻的现实意义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灾难便一直如影随形,人类一直与之进行着搏斗,即使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人类仍然无可避免地遭受各种灾难的打击,要与灾难进行抗争。“新冠疫情”从2020年初一直蔓延至今,当下发生的种种都像是放电影一般在《白雪乌鸦》中一幕幕呈现着,这与作品在非典影响下的作家创作背景密不可分,而非典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性,这正体现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3]¹⁶迟子建用温情的笔法有意识地消解灾难给人们带来的伤痛与苦难,更多地作品中塑造出众多的典型化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绘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升华,表现出作品的主题不在于灾难本身而在于人性的展现,从而发挥文学的人文关怀作用,让处于灾难中的人们心内有光、脚底有力。也许会有人说,在灾难面前,文学无用,唯医者至上。但是常言道医者仁心,而文学的作用不正在于仁心吗?伴随着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也进一步地得到了肯定,不再是人命如草芥、如蝼蚁,因此人们对有温度的文学作品的期望与寄托被进一步地放大。正是因为这种文学作品的诞生,让人们在残酷的灾难中获得了精神慰藉,警醒着人们之间的爱与责任,对生命充满着怜悯之情。因而《白雪乌鸦》深刻的现实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在同样发生着疫情的当下,其对世人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二、为何要探讨灾难中的人性

我们怎样看待灾难？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灾难？灾难是对人性的摧毁，还是对人性的重建？灾难对于人性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处于灾难中的人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放在灾难这一事件本身，以及这一事件当中的人所暴露出来的本质。“人心是艺术的基础，就好像大地是自然的基础一样。”^{[4]98}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潜藏着另一个自己，代表的是自己内心真正渴求的内容，是对自我意识的充分实践，是人心的真实体现。当灾难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蛮横外力介入，打破了人们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人的内心世界这一内在因素与灾难这一外在因素相结合，弱小的生命与强大的灾难相对比，所引发的是人类处于极端恐惧的危机状态下的无助与本能。灾难会激发人的最原始的需求与渴望，因而只有当人类面临灾难时，人性才会真正地展露无遗。

在灾难中所呈现出的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事件，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人性。有面对灾难自私自利、胆小怕死、损人利己之辈，也有面对灾难毫无畏惧、勇敢激昂、敢于牺牲之人，他们体现的是人性深处最隐秘、最真实的欲望，通过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灾难之中形成正面人物与反派人物针锋相对的一个极端现象。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人性，高尚、正义、善良与卑鄙、奸诈、邪恶之间的抗衡和较量。在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所展现的人性进行探讨研究之后，或许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个体情感与群体精神的共鸣，对反面人物起到感召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地认识到“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5]319}。因而文学作品对人、对生命的人文关怀作用尤为重要，缺少这一环，作品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不能往生。中国的灾难文学作品，受到中国儒家传统的影响，体现这一创作追求的文学作品尤为众多。例如阿来的《云中记》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超越生死，跳脱出传统观念，用一种理性而又深沉的眼光去发掘审视人、大地与自然在灾难中的经历和改变，最后上升到哲理层面，告诉人们自然万物是相互转化的，人的死亡并不是终结，以此来激励失去亲人们的人们勇敢地生活，同时也是对逝去的生命的一种宽慰与疗救。这是作家责任意识体现，更体现了灾难文学所应当承担的职责。在灾难文学作品中通过对灾难中所展现的人性的探讨，从一系列生活现象上升到对人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不仅是作品由低到高的升华，更是作者自身思想和视野的开拓与升华，是作者与读者双方的受益与双赢。

三、《白雪乌鸦》中“灾难下的芸芸众生”

（一）正义的化身

《白雪乌鸦》以商人傅百川和医者伍连德为代表构成了书中无可争议的正面人物形象，虽然着墨于他们形象刻画的文字并不多，但作者还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精心琢磨，用她饱含温情的笔调向人们完美地呈现出这一类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商人，傅百川拥有的是财富与经营者的果敢，颇有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气魄，但茅盾在刻画吴荪甫时突出了其自身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的许多弊端，而迟子建对傅百川的刻画却并不凸显阶级的意识，完全体现的是面对疫情时，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勇气的商人的所作所为。面对灾难，傅百川让药铺的中医免费为老百姓熬制中药，即使得到的回馈并不美好，但他仍然满怀希望。在接下来的抗疫过程中，他还出钱召集女工为老百姓制作口罩以预防鼠疫。这不正是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中众多良心企业捐献物资这一行为的真实写照吗？疫病无情，人间有爱，无论是在一百年前的东北亦或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今天，总有这样一类敢于承担责任、无私奉献的有良知

之人,正是因他们才唤起了更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良知与道德。

如果说傅百川代表的是外部力量的崇高,那么作为将百姓从鼠疫中拯救出来的医者形象——伍连德无疑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体现。伍连德一开始到傅家甸开展控制鼠疫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与外国医生所持的救治理念不同,他所提倡的防疫措施并不被采纳,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隔离措施的医院、医生、病人,所导致的后果则是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终于随着死亡数字的不断増加,以及迈尼斯的离开,伍连德逐渐获得了信任,使他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鼠疫,这是用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经验教训。在疫情最为严重时,伍连德为了有效控制不断蔓延的疫情,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绝无可能被接受的决定——焚尸。在传统社会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中,人死后躯体是应当保持完整的,但伍连德主意已定,即使没能等到上级的同意,他仍然决定要在计划的时间内焚烧尸体,减少不断増加的死亡人数。这样的行为是大义,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处,揽下一切责任与谩骂,换来的是更多生命的保护与延续。但作者并没有把伍连德神化,以免让人感觉这样的人仿佛不存在于世间。通过对伍连德一系列的动作以及真实心理活动的描写,给读者营造出了极强的抗疫历史画面,让我们感受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将距离感大大缩小,让处在灾难之中的神圣之光得以真实地展现。

(二)对“恶”的书写

毋庸置疑,高尚的人物之所以高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体现出来的高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与丑恶人物的设置形成的对比,在《白雪乌鸦》中自然也不例外。翟役生与纪永和毫无疑问地在小说中体现了灾难之下人性丑恶的两个方面:对生命的亵渎与自私自利的行为。翟役生因家境贫寒被送进宫中做太监,遭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逐渐在他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心理扭曲异化。金兰的死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再感受到人世间的爱与阳光,也失去了好好生活的希望,因此他仇恨这个世界,仇恨所有人,看到鼠疫中更多的人死去反而感到幸灾乐祸。单独看翟役生的这种变态心理无疑会遭到所有人的谴责,但迟子建的温情叙事给予了他存在的合理性,翟役生曲折的身世或许是造成他扭曲变态心理的直接原因,迟子建秉承着爱的哲学,化恶为爱,给这一人物的“坏”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缓和,呈现给读者的是在灾难下被剥离的人性,是与正义相对应的另一个阵营。

再看纪永和,同样是一个商人,他的所作所为却与傅百川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善一恶、一正一邪的对比设置使得小说更加具有真实性,反映出灾难之下生活的万象百态。迟子建将纪永和作为一个商人的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本性刻画得淋漓尽致。在鼠疫爆发之前,纪永和的吝啬体现在他会因翟芳桂喂了乌鸦两把粮食而心疼粮食并憎恨乌鸦这种细节上。并且让人发指的是他让妻子翟芳桂变成赚钱的工具,将自己的谋利行为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在鼠疫爆发之后,纪永和一发不可收拾,他贪婪地囤积粮食不肯出售,内心盘算着借机大发国难财,甚至心理扭曲到通过节食来缩小开支。这些行为将他的贪婪与吝啬本性暴露无遗。有因皆有果,纪永和的吝啬与贪财无疑是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为了抓住商机的纪永和雇佣装卸工搬运大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感染了鼠疫,直到死他还放不下他囤积着想要发财的粮食,俨然已经走火入魔。在他死后,粮价正如他所料那样大涨,他囤积的粮食赚了很多钱,可是这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了,不免让人唏嘘。迟子建对纪永和的细心刻画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视钱如命、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成为她所构造的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丰富了我们对于灾难下复杂人性的理解。

(三)小人物的坚守

“小说的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6]260}迟子建在《白雪乌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因此小说中各种小人物的描绘刻画也尤为重要。在众多的小人物中,王春申无疑是作者着墨较多并且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主要人物形象,作者通过他的出场与离场串起了全文。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人性的影子,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共存体,我们可以看到爱情、亲情、友情三

者在他身上的体现。

王春申的个性可以用唯唯诺诺来形容,在爱情中他一直处于妥协状态,面对吴芬与金兰的公开出轨行为,他选择了让步,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黑马和亲生儿子的身上,对于自己心仪的对象谢尼科娃也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喜欢着。鼠疫爆发之后,他的两个女人先后死去,儿子和谢尼科娃最后也没能幸免,自己生命中的爱人、亲人都离开了这个世界。面对爱情与亲情的毁灭,窝囊的他遭受了巨大打击,但是王春申的本性是善良的、坚韧的,即便是曾经嘲讽伤害过他的妻子和小妾,当她们在鼠疫中丧生之后,他还是选择原谅,并且在灾难面前显示出超乎想象的坚强,最终勇敢地担负起抗击鼠疫的责任。在王春申的身边一直陪伴着他的是那匹大黑马,作者对黑马的描写占到了相当大的篇幅,对于王春申来说,黑马的存在就像是陪伴他的朋友,是对他的一种精神慰藉,这何尝不是作者对于作品中人物人道主义之光的显现,为王春申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王春申在灾难中的坚守是众多小人物在灾难面前的一个缩影,他们既没有像伍连德和傅百川那样的大义,却也守住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底线,没有变成像翟役生或是纪永和之流,虽然没有大善,但作为一个有缺点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贡献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白雪乌鸦》可谓是道尽了疫情下的人生百态,灾难中的世道人心。

四、《白雪乌鸦》中的人文关怀

《白雪乌鸦》中迟子建笔下的温情叙述让我们看到了灾难中人生的苦难和残忍,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温暖。在作品中,迟子建人文关怀的展现主要是通过鼠疫中各种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的对立比较来体现和诠释的。作者不仅饱含温情地批判人性中的丑恶、描绘人生的不幸和悲哀,而且更加关注对人性真、善、美细致入微的探索和挖掘,使得善恶、正邪的对立通过温暖深情的笔触构架起彼此转换的桥梁。

作品中的人文关怀首先是对灾难中人性之善的温暖诠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迟子建秉承着这样的创作思想,在《白雪乌鸦》中没有塑造出极善极正的完美之人,像傅百川这样的仁义商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感上的弱点。在疫情中,他做出了一个商人的表率,不哄抬物价,主动承担控制疫情的责任,为疫情出钱出力,体现了他道义上的刚正不阿。在情感上,他有着像许多平凡人的困惑,面对受到刺激后疯癫的妻子,他也不得不将感情寄托于另一个女人的身上,甚至是一个有夫之妇。可是对于于晴秀的情感并没有让他逾越道德的底线,做出抛弃疯癫妻子的行为,只是将这份情谊埋藏于心底,默默地关怀。傅百川以一种从容的态度和商人的冷静心理来处理情感上的困惑,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退缩,因而某种程度上也赋予了这一人物形象一种懦弱的特质。但是在迟子建的笔触下,却使得这一种遗憾成为对人性善良的呈现。

其次是对灾难中人性之恶的温情观照。灾难是人性的试金石,在鼠疫的威胁下,傅家甸的恶人们先后出场,在他们之中,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太监翟役生这一人物形象。进宫做太监本就使得这一人物带上了某种程度上的悲凉色彩,被打断腿逐出宫后,得知父母被火烧死,妹妹被卖到妓院的遭遇更是将翟役生的命运悲剧刻画到了极点,令人同情。幸而有金兰的宽慰让他逐渐找回人生的意义,但是鼠疫无情地夺走了金兰的生命,同时也带走了翟役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善良。命运的坎坷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对生活充满绝望,以一种消极的厌世心态诅咒着这个世界,诅咒着人类。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迟子建笔下也同样被用温情的力量所观照着,“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在不经意中被挖掘出来”^{[7]239}。在翟役生的身上同样也留存着善良的东西,让他的人性之恶得到了一定的宽恕。

在《白雪乌鸦》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迟子建对于人性中善良美好一面的展示,为善者有性格上的缺陷,作恶者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用温情的书写去融化善恶对立的壁垒,用善良与希望战胜邪恶与病态,

这既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和良知。

五、结语

迟子建采用历史记忆的追记书写,透过死亡者的累累白骨,用饱含温情的笔触,通过人性表现对生命的尊重,向读者展示了百年前哈尔滨的那场灾难,让人们体悟灾难下生命的脆弱与强大,用温暖与善意当武器去抗衡无情的灾难,超越生死,抒写希望。有人曾说灾难文学“应该起到认知的治疗作用,让他们用很小的努力,去找回存在的意义,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感。”^[8]可以说,迟子建的书写做到了,她为灾难文学作用的发挥贡献了一份力量,担当了一份责任。在灾难面前,人性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人性仅仅能代表某一方面,并不能将所有都囊括其中。但通过对作品中具有典型性的几个人物的分析,对于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或许可能遇到的灾难会有所思考、有所准备,恰如今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通过文学的记忆,发挥文学的作用,认识灾难文学对于人的精神的治疗和重建功能,发挥灾难文学对于人类社会生存的重要价值,张开生命里多种向上的能量,警醒群体之间的爱与责任,启示人们相互之间的帮助与怜悯,以此增强孤独个体身心中的精神抵抗力。

[参 考 文 献]

- [1] 钱谷融. 文学是人学,艺术也是人生[N]. 文汇报,2016-07-18.
- [2] 冀宏伟. 温情是穿透苦难的力量[N]. 河北日报,2020-04-10.
- [3] 刘安海,孙文宪,编. 文学理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 雨果. 雨果论文学[M]. 柳鸣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5] 李建军. 文学因何而伟大[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 [6] 迟子建. 白雪乌鸦·后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7] 张清华,毕文君,王世强,等. 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 [8] 严静. 当代中国灾难文学的社会价值[J]. 大众文艺,2014(22).

The Writing of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Focusing on Chi Zijian's *Snow Crow*

Wang Junhu Liao 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Chi Zijian's *Snow Crow* tells the dail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Fujiadian during a plague in Harbi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author shows people's living difficulties and spiritual world through the disaster situation in the work, and shows the vitality and inner character strength of the work.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 era of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typical characters in the *Snow Crow*,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human nature of writing, examines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tortur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ife, and explores the humanistic care in the works, it be of great advantage to ponder over the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of "what is literature" under the disaster.

Keywords: *Snow Crow*; disaster; humanity writing; humanistic care

[责任编辑:孟西]